

銘刻於身體，疾病見證

Inscribed on the Body, Witness of Illness.

文・圖 | 李欣倫

二二八連假，父親突然語無倫次，臉蒼白，站不穩，母親緊急叫救護車，送進急診室。匆匆趕往急診室，病床上的父親看起來像縮水了。

隔日轉送長庚醫院，檢查是心臟問題。手術前，醫生和我們解釋，父親的心臟功能只剩下百分之 20（正常人的三分之一），「心臟看起來有沒有在跳都不知道。」聽到這句話，妹妹感覺心臟也停止跳動了一拍。

爸爸的心臟放了 3 根支架後三天，出院了。
不到一週又送進急診室，這次住了十天。

二十年前，我的第一本散文集《藥罐子》出版，父親出現在不少篇章中，記得當時我邊寫文章，邊問他某些漢藥的療效，一向鮮少對話的父女倆，因為這本書而開始了漢藥的討論。在我的第一本書裡，父親是大寫的，尤其是中醫師，是街坊鄰居求診、諮詢的對象，我對他敬畏有加，直到他十年前做了心導管手術，類似的場景：救護車，手術室的門，心臟裡的三根支架。當他成為病人，我才稍微懂得醫病之間錯綜的關係。

疾病剝除身份、性別、資歷。
疾病將人還原回到原初比例，在新長出來的種種之前。

寫《藥罐子》的同時，我著手寫碩士論文《戰後臺灣疾病書寫研究》，當時這個議題在臺灣文學研究中尚屬新鮮，於是在學校圖書館搜索一本本文學作品，又似懂非懂生吞活剝傅柯的瘋狂史及西方醫病論述，讀著寫著，也曾將自己寫進了陰影，卡在暗面中出不來，失眠無食慾，低落、厭世感輪番出現，直到閱讀心靈工坊出版許佑生的《晚安，憂鬱》，撫摩著每個字細讀時，才懷疑當時的自己是否也漂流在藍色的寂寞星系中。

當時，我反覆閱讀的還有蘇珊·桑塔格《疾病的隱喻》，她談肺結核成爲西方浪漫隱喻的歷史，予我諸多啟發，於是我以嘗試以隱喻來談臺灣戰後小說，從除魅的角度談華文作家的病人誌，由此探知了幾個延伸議題，如寫作的療癒性，這至今仍是衆人辯證的議題。

有人主張寫作重新撕開傷口，痛苦重現，不是療癒。復原乃極緩慢的過程，難以速成。有人也分享書寫過程中確如凝視創傷，但寫著寫著，文字和時間形成雙重距離，回看往昔痛楚，竟也發現疤痕改變了形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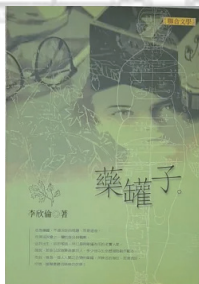
我始終認爲，能否療癒，有時不全然仰賴寫作者的觀點，從讀者立場來說，應該都會有讀了作者細數傷口的文字，進而變得對塵世更有抵抗力的經驗吧。

就像我去臺灣文學館看「寫字療疾：臺灣文學中的疾與療」，所感受到的那樣。看著館內各式媒材上，銘刻著寫作者爲疾病所壓迫，與之搏鬥，進而共處的文字，有種從深深的海底漸漸浮出海面之感。疾病迫我們窒息，隔離，孤單，懷疑，恐懼，然而，疾病也讓人生出門志和勇氣，得以重新呼吸。臺灣作家群揭露傷口、重現病痛，或他們替我們死了一次又一次，爲讀者帶回了身體及生命複雜得無以復加的秘密。

銘刻於身體，文學替我們留下諸多的痛感和創傷記憶。

湯瑪斯·林區（Thomas Lynch）在《皮囊之下：15 則與身體對話之旅》，引述麥可·赫弗南的詩作：「擁有身體是爲了學習哀悼」，他進一步延伸，所有的情感記憶，傷痛或歡愉，全保留在身體裡，「在我們的骨頭裡，大多數是我們對他人擁抱的想像，或是舊傷、老損和戰敗、得勝或停戰許久的戰役所殘留的感受。」

如是，疾病有時仿若動章，記錄會有過慘烈又輝煌的搏鬥史，以血取得，以淚換得。



李欣倫

任教於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。出版《藥罐子》、《此身》及《以我為器》等散文集。《以我為器》獲 2018 年國際書展非小說類大獎，亦入選《文訊》「21 世紀上升星座：1970 後臺灣作家作品評選」中 20 本散文集之一。

1 | 2

1 李霽群攝，李欣倫提供。

2 李欣倫《藥罐子》書封（聯合文學，2002）